

学术顾问：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全胜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李新泰 刘诗白 刘伟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国有 张曙光 张晓仙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学术支持：
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常务) 白卫星
主编助理：马红雨 吴维海 程宏科 刘世杰 张克亮

2019年10月22日 星期二 投稿邮箱: jxjzb@163.com 本刊订阅方法: 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 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 郑新立

【摘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晰了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布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使劳动者成为所有者。把无形资产列入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骨干带动作用。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关键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分配制度

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1.2 万美元是高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的分界线，到 2022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1.26 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量只占世界人口的 15%，中国占全世界人口的 18%，也就是说，中国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就能使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比重提高一倍多，达到 33%。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一百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带到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所以，回顾前 70 年和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应当感到自豪。而它的历史起点可以说就在北大红楼，是李大钊等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1921 年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中国人民有了先进的理论武器，才会有之后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不忘初心，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探索，彰显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探索。

改革 40 年，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结论最集中地体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



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些明确表述，是对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不断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为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按照这一要求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当前，应抓紧进行以下改革。

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要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这是三中全会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过去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是以管资产和管企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经营的自主权，不是有利于而是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企业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必须拥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包括对所占有的国有资产的处置权、投资权等，如果大小事都要向国资委请示，很难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的变化。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资产管理方式要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应根据不同情况，把多数所属企业逐步转变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企业，把少量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公司，包括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应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不断调整优化资本配置。哪些行业急需发展，比如对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

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卡脖子技术，我们就集中资金向这些领域投资。对一些成熟的盈利很好的行业和企业，就适当抽出一些资金，投放到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企业上来。通过调节资源配置，更好地履行国有资本管理功能，发挥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放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

所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不是国有资本功能的缩小，而是它的放大。例如汇金公司管了几十万亿元的金融资本，国有商业银行几乎都有其股份，汇金公司对其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委派一个董事或副董事长，参加它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参与它的重大经营决策，至于具体的经营管理，都交给商业银行自己负责。这样以管资本为主，效率高，管的很好。未来对绝大多数产业的国有企业，都应当仿照这样一个管理模式。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

现在国有企业大部分还是国有独股的公司，未来纯国有或纯民营的单一所有制的企业，会越来越来，混合所有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实践证明，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经济是各类所有制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一种经济形式。我们去浙江、江苏调研就可以看到，好多企业里面既有国有股，又有集体股，又有员工个人股，上市公司还有社会股，是混合所有的。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够发挥生物学上讲的杂交优势，把各类所有制的优越性集中在一起，从而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经济形式。

守正出奇，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新阶段

——管益忻主编访谈贾康教授

编者按：

十九大后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标志着供给侧从学术上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支撑。供给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从政策视角上给出的制度供给体系，以及由此触及质量、效率等方面的变革，对于解放、提高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九大给出了全面小康后“二步走”后的新路径、新目标，仍以供给侧为主线，应对新时代、新格局、新战略，为新旧动能转换从特定机理上提出了大策略大思路。

更深入、全面贯彻供给理论，将使我们在看到优势的同时，更关注我们的短板，克服短板的赋能策略和赋能力度！与此同时，也特别警醒地告诉我们，“老大”与“老二”的对决之不可避免，这更要求我们以供给侧理论及相关制度、政策的供给，激发起活力、动力与潜力，推进现代化的飞跃发展。

时下，以供给侧为主线，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中美对峙的态势特别应明确以下三个战略转变：

(1) 变压力为动力。变压力为动力是贯彻供给侧主线的内在要求。

(2) 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动为主动是贯彻供给侧主线的必然逻辑。

(3) 变局守常态为守正出奇。守正出奇是科学贯彻供给侧主线的主体战略构想。围绕上述三个转变，近日本刊主编管益忻先生对贾康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详情如下。

管：供给侧在今天稳中求进的背景下，特别是今年下半年以至于明年，整个格局大的变迁，像最近的一带一路、中美较量，供给侧很有可能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独创。在这个背景下，聊一聊新的想法。

贾：我先简单按您这个主题说说基本看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说是战略方针，到了十九大把它明确表述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那么在相关的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我们觉得对它最基本的认识，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应该认为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说的生产关系改革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在改革的深水区，做这种全称的表述，确实加重了表述上的学术色彩。我的说法就是它体现了现在决策层在做出统观全局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这方面，有意识地体现要得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

供给侧落在改革上，反映的就是这个改革是要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的问题，学理上直接把供给侧标出来了。这样一个制度供给在我们研究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等融合之下，从这个框架内来看，它是解决解放生产力的龙头因素的问题，就是领导人说的改革是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之所在，所以它是龙头因素。这个供给侧的制度供给，它首先涉及的是解放生产力必须优化相关的制度结构，那么结构性跟着就来了，体现在实际生活中的利益格局，怎样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得到攻坚克难的优化，这就解放生产力，调动潜力、活力。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前置词带出改革来，成为一个改革的全称。当然这个改革是要带来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它是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继续在超常规

发展的道路上来接近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邓小平当年说的三步走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先要有全面小康，然后再有三十年去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十九大是在全面小康以后又给出新的两步走的节点目标，2035 年基本建成现代化，2049 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新旧动能的转换一定要依靠改革的深化，啃硬骨头，真正把未来最关键的十年或十几年的瓶颈期攻坚克难冲过去。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央的战略方针和主线的定位上，要管全面、管长远，一直要对接到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过程当中在当下这个形势的严峻程度马上体现出来了。

另外一边我们的感受就是还得看短板，看我们现在受到的严峻挑战。我个人解读这个挑战的问题，我是愿意把它说成外部性的老大打压老二已成定局了，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这个压力和中國自己内部的矛盾凸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严峻挑战。中央也有意识，有思想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怎么样能够按照意愿实现现代化。所以，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供给，调动潜力活力去推动现代化来说，我认为在当下可能要说三句话。一个就是要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在老二的位置上，就是美国现在已经形成了朝野基本一致全面遏制中国的社会共识。它实际上就是从林法则，老大意识到老二挑战它的地位以后，所有东西都是借口。它真实的战略目的就是从贸易角度所谓贸易战全面遏制中国，不能让老二追赶上它。这个从林法则再次表明，人类文明到了一定的关节点上，还是实力的较量。我们得认账，在实力的较量方面，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和美国去对决的平台。不论从制造业、科技创新还是金融，还是进一步推进到

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还是以国有控股的形式存在。应通过混改，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包括外资入股，逐步使国有企业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并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科学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中国的企业同国外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个集中、高效、灵活的管理体制和可以迅速集聚分解的股权组合形式，建立起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最近国资委发了一个很好的文件，提出在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控股的比例不低于 34% 就可以了，员工持股不高于总股本的 10%，这个规定很好地体现了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过去一说搞混改，国有股要求占 51% 以上，而且还要合并报表，这就是一厢情愿，民营经济没人敢进去。因为我把资本投到你这里，我也没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都是你说了算，谁敢往里投。现在允许相对控股，在股权结构上形成相互制衡局面，为民营经济进入国有企业打消了顾虑。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一个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公司要想办好，至少应该有三个以上股东，两个小股东的股权之和必须大于大股东的比例，这样才能形成制衡机制，避免大股东为所欲为，侵犯小股东的权益。国有股不低于 34%，其他股东联合起来，就可以否决大股东的意见，形成一个民主的、公正的决策机制，这是办好企业的基本前提。

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使劳动者成为所有者

实践证明，员工持股特别是管理层和技术骨干持股，对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我们到美国去考察了许多跨国公司，像 IBM、GE 等这些百年老店，一问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是保险公司，第二大股东是人寿公司，第三大股东还是保险公司，前面几大股东都是来自于各类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这些股东并不参与企业管理，只看经营业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是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他们在企业里必须持有一定股份，而且在任职期间和离任后的三至五年内，股份不得出售，这就给管理层戴上一个金手铐，让他们全心全意把公司办好。

同时，技术骨干和中层管理者也要持股，像 IBM，员工有四十多万人，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都设有分公司。除了核心层的十几个人持有股份，下面二级公司的经理，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技术骨干、管理骨干共几百人也必须持有股份。

▶▶▶ [紫转 A2 版]

刘韵洁院士 纵论 5G 现状及中美比较

■ 管益忻

编者按：《经济学家周刊》拟在近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线索，相对集中编发一系列有关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军事等各领域、各方面的高水平、甚孚盛名专家、学者之高论、大作，以力求应对经济社会崛起打造出“中国学派”于当今之世界。今天，首发一文，即本刊主编管益忻先生采访、对话“著名网络专家”刘韵洁院士之作。本文介绍了 5G 大致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在 5G 方面的优劣比较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强调了当前世界共同的难题：延时、准确性。

管：今天，我们到您这儿来，主要请您集中谈一下关于 5G 的问题。首先，想请您概述一下 5G 的大致现状。接下来，想请您谈一下未来的远景。更深层次地说一下发展 5G 的伟大战略意义。总书记讲，人类命运共同体，5G 的发展对于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至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各个方面的影响，会带来什么大的格局，大战略的设计或者是大战略的新的场景。第三个问题是，中美较量中的 5G 问题，5G 在中美较量中的意义、作用，特别是中美关于 5G 的胶着点。

刘：5G 这个东西，从第一代大哥大手机开始，基本上十年一个周期，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这个规律基本上是比较吻合的。原来预测 2020 年进入到第五代 5G，由于大家期望值比较高，所以现在很多国外就提前宣布开通了，其实真正的应用我估计还得两年左右，这个得有个过程。

现在 5G 的特点是什么呢？以前我们互联网的应用主要在消费领域。互联网对人类贡献这么大，对社会改变这么大，对人民生活改变这么大，主要是在消费领域。移动通讯已经开始进入 5G，也进入到实体经济阶段。因为 5G 大家知道就是万物互联，就是解决物联网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说是规律也好，说是趋势也好，总之是有个问题匪夷所思。互联网是二十年一个周期。第一个二十年主要是在大学、研究机构做计算机的互联。WWW 发明以后，互联网的领域突飞猛进地发展。大概一零年前后，互联网开始和实体经济结合，但是那只是些开始准备。互联网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5G 移动通讯也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不管互联网也好，移动通讯也好，都开始从消费领域进入实体经济这样一个阶段。

5G 宣传得很厉害，大家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也是一个新的变革的机会，互联网是一个变革的机会，因为它要满足实体经济，急需需求！比如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农业互联网，它原来的网络架构满足不了要求，而传统的互联网在消费领域那是没问题的，消费领域的互联网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任何人只要上了互联网，都能跟网上所有的用户保证畅通的通讯。你发的邮件也好，发的信息也好，总会传到对方，这个功能非常强大。只要有二个网络地址，他们要通讯都可以完成这个使命。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或者延迟比较多，它总能传过去，这个对人类消费领域，是个了不起的贡献。但是进入到实体经济以后，光这个功能就不行了。

它不仅能联通，又要求你准时到达，这叫确定性的时延。就是能够确定性，我一秒钟到达就是一秒钟到达。一般都是 10 毫秒，20 毫秒，要求要到达，或者 5 毫秒要到达。它要求不要抖动，不要一会一毫秒，一会两毫秒。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实体经济，比如车联网，发的指令对路况的探测，前面障碍物的探测，要不断地发指令。多长时间发一个指令呢？两百微秒，就是 0.2 毫秒发一个指令，所以它的抖动就要求不能大于两百微秒。机床也是这样，对机床的控制，工厂的继电器的控制，都要求你这样。我们之间发个邮件，第一次没发成功再发一次就可以，对机床的控制就要求绝对精准。5G 也是需要这个东西，互联网也是需要这个东西。因为大家一说 5G 好像一切的解决方案都是 5G，其实 5G 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移动通讯这块，就是咱们手机到基站，另外一块是核心网、互联网的。没有互联网手机跟手机怎么通讯呢？不论是北京到南京的无线，到上海的无线，它就是手机到基站，再到互联网，再到南京的互联网，再到南京的基站，再到手机，很大一块需要核心网这块的功能，需要互联网配合才能做。所以这个延迟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在还没有解决。但你们也别泼冷水，我讲的顺序可能不对。

▶▶▶ [下转 A2 版]

▶▶▶ [紫转 A2 版]